

■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 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 龚 顺 王森泮 刘川菡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关键词：家庭政策；社会性别分工；中产阶层；结婚、生育意愿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3.0013

一、引 言

家庭政策是世界各国政府为应对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人口挑战而实施的政策性工具。家庭政策一般通过家庭补助、税收优惠、生育补贴等配套措施的支持来提高民众的结婚与生育积极性。

关于家庭政策的类型，不同研究往往依据不同分

类标准^[1]。延承西方福利国家权力资源论的研究范式，有学者按照“是否有利于促进夫妻间性别平等、是否有助于维持传统男性养家体制”等因素，将家庭政策分为三类：（1）通用型家庭政策，旨在鼓励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以维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2）双薪型家庭政策，通过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促进男女平等，削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3）市场型家庭政策，

即政府不干预社会性别分工,而将其交由市场力量完成^[2]。通用型家庭政策的路径包括育儿津贴、家庭税收减免和定额补助的育儿假等。双薪型家庭政策包括与补助薪资挂钩的母育假、自愿或强制型父育假等。市场型家庭政策则表现为上述政策手段都不发达^[3]。

那么,日本的家庭政策属于何种类型呢?安德森(Andersen)将日本的家庭政策模式称为“日式社团主义”(Japanese style corporatism),即政府通过家庭政策鼓励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和照顾老幼的责任,以保证男性全身心地投入终身雇佣的工作中去^[4]。此外,日本家庭政策还将女性婚育福利与其丈夫工作形式和收入挂钩,形成妻子对丈夫的强依附关系。可以说,日本家庭政策具有鲜明的通用型家庭政策特征。因此,研究日本家庭政策的效果有助于学界进一步认识通用型家庭政策对民众结婚和生育积极性的影响。

日本经验研究的结果也可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定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完善。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国家,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文化等方面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新发展阶段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提供一些借鉴。首先,中日两国晚婚和低生育现象出现的原因类似。研究发现,从传统主义向个人主义的态度价值转变是导致西方社会结婚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5]。而与之不同,对结婚与生育的直接与间接成本考量才能有效解释东亚国家的结婚和生育现象^[6]。其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日两国在社会性别分工文化方面都相对保守。中日两国同属儒家文化体系,具有强烈的家族主义色彩。日本被称为后工业化国家中家庭文化最传统的国家之一,社会性别分工传统、性别不平等程度较高。“婚姻包袱”这一家庭社会学领域具有世界影响性理论的提出也是基于日本经验^[7]。相较于日本而言,中国社会性别分工虽然相对平等,但家庭照料的责任仍主要由女性承担^[8],女性在职场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9],家庭内妻子的社会地位认同也高度依附于丈夫^[10]。可以说,“男主

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在中国仍占主导地位。

二、文献评述:家庭政策可以提高结婚、生育意愿吗?

面对生育率下降和晚婚化加剧的局面,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家庭政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11][12]}。学界关于家庭政策讨论的视角非常多样。本研究关注的是家庭政策是否可以有效提高民众的结婚和生育积极性问题,因此,主要回顾了家庭政策是否有效的研究。

家庭政策发挥效用的主要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家贝克尔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的家庭论^[13]。他认为与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一样,结婚与生育也是一种市场行为。人们通过比较结婚和生育的成本与收益,来选择是否结婚与生育。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人们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就越低,反之,人们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就越高。这里的成本既包括结婚与生育的直接经济成本,也包括与之相关的机会成本。家庭政策作为世界各国解决晚婚、低生育率社会问题的关键政策手段,通过家庭补助、税收优惠、生育补贴等支持手段,能够有效降低结婚和生育成本,增加收益,从而提高结婚与生育意愿。但也有研究认为,由于家庭政策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与援助有限,对提高结婚和生育意愿效果微乎其微。围绕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家庭政策的效果评估成为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既有的经验研究分别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和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出发,分析了家庭政策的有无、强弱对民众结婚和生育积极性的影响^[14]。

支持家庭政策正面效应的研究认为,家庭政策力度越大、覆盖越广泛,民众的结婚、生育积极性就越高。比林格斯和费拉里尼使用欧洲综合调查数据证明,在控制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情况下,那些家庭政策越完善的国家,其民众的生育意愿越高^[15]。一项基于德国的家庭政策的经验研究显示,东德在1977年所实施的家庭政策使其在十年后出现了较高的生育率^[16],这被认为是家庭政策具有长期效果的证据。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们则认为,由于家庭政策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与援助有限,无法弥补结婚和生育的巨大成本损失,家庭政策的效果有限。例如,有研究通过比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1个国家的

数据发现, 家庭政策和各国总和生育率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17]。科格尔使用时间序列的跨国数据, 也否定了家庭政策与结婚和生育率的正向相关性^[18]。此外, 他还发现即便是那些为了缓解女性家庭—工作冲突、促进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 对女性的结婚和生育积极性的提高效果也并不显著。

三、研究假设

在过去数十年, 日本社会经历了历史空前的人口形势转型过程。数据显示, 日本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从1970年的26.9岁上升到了2017年的31.1岁, 女性平均结婚年龄从24.2岁上升到了29.4岁, 总和出生率从1970年的2.13跌落至2017年的1.43。日本成为后工业化国家中晚婚化和低生育率等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引起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广泛关注^{[19][20][21]}。

面对生育率下降和晚婚化加剧的局面, 日本政府自1992年开始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既包括税收减免和经济援助政策, 也涵盖育儿休假、保育机构和母子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支持举措。例如, 1992年, 日本开始实施育儿休假制度。之后, 日本于1994年实施“天使计划”, 在延长托儿所、幼儿园托管时间和充实生育医疗保障方面制定了相关政策。19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新天使计划”, 进一步为家庭的生育和育儿提供支持。2000年以后, 日本的家庭政策进一步完善。2002年, 日本政府提出“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 大力发展育儿机构, 为日本家庭提供育儿支持。2003年日本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 以法律形式明确完善育儿制度, 解决少子化问题。2004年, 日本又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家庭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的婚育提供了支持, 但其目的仍在于, 通过家庭政策鼓励女性承担主要家庭照料责任, 从而维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因此, 日本家庭政策具有显著的通用型家庭政策特征。

日本的家庭政策是否能有效提高民众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呢? 目前, 既有的研究更多关注了社会结构性因素(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学历程度)和个人主观性因素(如价值转变)对民众结婚和生育积极性的影响, 而缺乏对家庭政策效用的分析。部分研究虽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的效果, 但以理论性研究为主, 并没有统一的结论。例如, 有学者将21世纪初日本生

育率的微增归功于之前实施的家庭政策^[22]; 但也有研究认为日本家庭政策对提高结婚和生育的效果微乎其微, 与日本人口更替水平和目标生育率都相差去远^[23]。可以说, 目前关于日本家庭政策效果的讨论更多停留在了理论分析的层面上, 缺乏对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为验证日本家庭政策的效果, 本研究提出一组对立假设:

假设1a: 日本的家庭政策可以有效提高民众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假设1b: 日本的家庭政策不能有效提高民众的结婚和生育意愿。

此外, 我们还研究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男女的影响。决定个人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包括实际的经济成本和收益, 还源于个体主观感知到的经济压力与成本^{[24][25]}。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 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男女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 社会性别分工构建了男女不同的社会分工, 决定了不同阶层男女面临结婚和生育时的成本与压力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家庭政策对缓解结婚和生育压力较高群体的效果更强, 同样支持力度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男女的影响可能也存在较大差异。

从女性角度来讲, 性别公平理论则强调, 性别平等水平在不同社会领域的不一致性, 导致了中产阶层女性结婚和生育成本较高^[26];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性别平等水平高, 女性可以参与社会劳动; 而在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水平低, 即便是高学历中产阶层女性也不得不承担大部分的家庭劳动。这使得中产阶层女性既要承担劳动力市场的责任, 又要承担家庭照料职责。学者们称之为“第二轮班”或者“婚姻包袱”^{[27][28]}。

而对男性而言, 传统社会性别分工背景下, 不同阶层的男性面对的结婚和生育压力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 社会对男性赚钱养家能力要求较高。与其他阶层的男性相比, 中产阶层男性不仅面临赚钱养家的压力, 他们也无法像低社会阶层的同伴一样降低生活质量。这造成他们面临结婚和生育的焦虑可能也会更严重。因此, 在同样支持力度家庭政策下, 由于中产阶层男性感知到结婚和生育的经济压力更大, 焦虑程度更高。家庭政策所提供的家庭税收减免和经济援助等帮助, 对提高中产阶层男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的效果可能也更强。

因此, 本研究继续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受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影响,日本家庭政策对提高中产阶级女性结婚和生育意愿的效果更强。

假设3:受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影响,日本家庭政策对提高中产阶级男性结婚和生育意愿的效果更强。

四、数据与方法

1.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日本明治安田研究所于2022年和2009年组织实施的“婚姻与生育相关的调查”项目。其中,2022年的调查主要用于对比研究。分析显示,日本无论从社会背景还是社会性别分工状况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平稳时期,结婚和生育相关指标并没有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动。该调查依靠日本最大调查公司MacroMill所实施。调查以MacroMill公司的230万名日本居民样本库为总样本,按照日本47个都道府县区域为单位,随机抽取年龄在20~40岁的未婚男女进行调查。本文问卷实验调查数据共调查了7494位20~40岁的日本未婚男女。之所以选择未婚男女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是因为研究已婚男女结婚意愿无任何意义。已婚男女的生育意愿受现有家庭和婚姻关系的影响较大,这可能会干扰对政策评估的净效应。此外,由于实验之前未婚男女对家庭政策的了解更少,对其分析也更有助于评估政策效果。

2. 实验操作

本研究采用基于随机分配的问卷实验法来考察日本家庭政策的影响。这一方法能够控制“未知”干扰因素,有效避免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目前,问卷实验法广泛运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29][30][31]}。数据按照奇偶数将问卷随机分为A卷和B卷。A卷向受访者展示了日本的17条家庭政策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涵盖了生育保障和配偶支持政策等信息。此外,为强化实验效果,A卷还将每一条家庭政策所提供的支援换算成具体数额供受访者参考。

展示完所有家庭政策信息之后,A卷受访者回答了本人的结婚与生育意愿。B卷没有对受访者提供任何家庭政策的支持和补助信息,只询问了受访者的结婚与生育意愿。换句话说,A卷所在组是受家庭政策刺激的实验组(共3765人,占总体样本的50.24%),B卷所在组为对照组(共3729人,占总体样本的49.76%)。实验组和对照组唯一的不同在于受访者是否接受了家庭政策的实验效果。因此,该研究设计

符合问卷实验研究的设计要求。

3. 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受访者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结婚意愿”为定序变量,题目有四个选项,1代表“完全不想结婚”,4代表“非常想结婚”,数字越大表示结婚意愿越高。“生育意愿”是受访者对“希望生几个孩子”的回答,数字对应受访者希望生育孩子的数量,由于很少有受访者回答不想生和数量在3个以上,为了模型的简约性,本研究只保留了回答3个以下(包括3个)的受访者,将生育意愿转换成“1~3”的定类变量进行处理。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包括实验组、控制组和中产阶级变量。组别包括实验组和对照组。我们使用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界定受访者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将大学学历及以上群体界定为中产阶级。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受访者的年收入、年龄和“目前是否单身”。遵循固有的处理策略,对年收入取自然对数。年龄是一个连续性变量。单身状况是类别变量,分为单身和非单身(有恋爱伴侣)两类。

五、分析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报告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实验组与对照组受访者在社会阶层、年收入、年龄和单身者比例等方面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差别。这进一步证明了本文使用的问卷实验的随机性。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

	实验组	对照组	F/χ^2 Tests p -values
结婚意愿(%)			
非常低	8.2	9.4	$p < 0.001$
低	16.9	19.5	
高	45.0	45.8	
非常高	29.9	25.4	
生育意愿(%)			
一个孩子	11.6	10.7	$p > 0.05$
两个孩子	68.0	67.9	
三个孩子	20.4	21.4	

(续表)

	实验组	对照组	F/χ ² Tests p-values
中产阶层占比 (%)	52.82	50.84	p > 0.05
年收入的対数 (万日元) (均值)	4.82	4.83	p > 0.05
	(1.83)	(1.82)	
年龄 (均值)	29.01	28.88	p > 0.05
	(5.48)	(5.49)	
单身占比 (%)	41.7	41.6	p > 0.05
N	3, 765	3, 729	

注: 连续性变量的数值表示为均值, 括号内为标准差; 定类变量的数值是百分比。

2. 模型分析

(1) 家庭政策与结婚、生育意愿

为研究日本家庭政策对民众的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 表2报告了日本家庭政策对结婚和生育意愿影响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结果。

模型1显示,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日本家庭政策可以显著提高结婚意愿。具体而言, 实验组的受访者比对照组的受访者回答高结婚意愿的发生比高出24%, 且具有统计显著性 ($p < 0.001$)。此外, 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显示, 无论对女性还是男性, 家庭政策都可以有效提高其结婚意愿。在女性样本中, 与对照组的受访者相比, 接受家庭政策干预的实验组受访者回答高结婚意愿的发生比高出21% ($p < 0.001$); 在男性样本中, 这一发生比则高出28% ($p < 0.001$)。

模型3、模型4和模型5报告了家庭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从结果来看, 无论是总样本还是男女分样本中, 家庭政策都无法显著提高民众的生育意愿。即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受访者在生育意愿方面并不具有统计上显著性差异。

总结发现, 分析结果与假设1a和假设1b都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发现日本家庭政策对结婚和生育意愿影响并不相同。日本家庭政策虽然降低了结婚和生育成本, 但其补助极其有限, 只能提升人们的结婚意愿, 并不能提高生育意愿。这可能是因为结婚和生育成本之间巨大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对于大部分日本家庭而言, 生育成本远远高于结婚成本, 这导致了日本家庭政策虽能提高生育意愿, 但对提高生育意愿的效果有限。

表2 家庭政策对结婚、生育意愿影响的序次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结婚意愿			生育意愿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总样本	女性	男性	总样本	女性	男性
实验组 (参照组: 对照组)	1.24***	1.21**	1.28***	1.09	1.10	1.08
	(0.06)	(0.08)	(0.08)	(0.06)	(0.09)	(0.08)
女性 (参照组: 男性)	1.46***			0.80***		
	(0.07)			(0.05)		
年龄	0.99	0.99	1.00	0.92***	0.91***	0.94***
	(0.00)	(0.01)	(0.01)	(0.01)	(0.01)	(0.01)
年收入的対数	1.13***	1.11***	1.14***	0.98	1.01	0.95*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单身 (参照组: 非单身)	0.45***	0.43***	0.48***	0.93	0.92	0.95
	(0.02)	(0.03)	(0.03)	(0.05)	(0.08)	(0.08)
中产阶层 (参照组: 其他)	1.30***	1.39***	1.20**	0.95	0.99	0.90
	(0.06)	(0.09)	(0.08)	(0.05)	(0.08)	(0.07)
分割点1	0.13***	0.07***	0.16***	0.01***	0.01***	0.01***
	(0.02)	(0.01)	(0.03)	(0.00)	(0.00)	(0.00)
分割点2	0.53***	0.29***	0.67*	0.33***	0.33***	0.40***
	(0.07)	(0.06)	(0.13)	(0.06)	(0.08)	(0.09)
分割点3	4.19***	2.22***	5.55***			
	(0.60)	(0.43)	(1.09)			
Pseudo R-square	0.04	0.04	0.03	0.03	0.03	0.03
样本量	6, 441	3, 212	3, 229	5, 667	2, 725	2, 942

注: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双尾检验); 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

(2) 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男女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

为检验假设2、假设3中关于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男女的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需要使用家庭政策和社会阶层的交互项进行验证, 分析结果见表3。

为了更加直观展示非线性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

我们绘制出了家庭政策对结婚和生育意愿影响的图示。图1是关于家庭政策对不同社会阶层青年男女结婚意愿影响的分析结果，图2是对生育意愿影响的结果。

表3 家庭政策对结婚意愿影响的序次逻辑
斯蒂回归模型（交互项）

	结婚意愿		生育意愿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实验组（参照组：对照组）	1.03	1.34**	1.22	1.29*
	(0.09)	(0.14)	(0.14)	(0.16)
年龄	0.99	1.02**	0.91***	0.94***
	(0.01)	(0.01)	(0.01)	(0.01)
年收入的対数	1.11***	1.14***	1.01	0.95*
	(0.02)	(0.02)	(0.02)	(0.02)
单身（参照组：非单身）	0.43***	0.44***	0.92	0.95
	(0.03)	(0.03)	(0.08)	(0.08)
中产阶层（参照组：其他）	1.17	1.28**	1.11	1.04
	(0.11)	(0.12)	(0.13)	(0.12)
中产阶层（参照组：其他）*实验组	1.42**	0.93	0.81	0.75
	(0.19)	(0.12)	(0.13)	(0.12)
分割点1	0.07***	0.13***	0.01***	0.01***
	(0.01)	(0.03)	(0.00)	(0.00)
分割点2	0.27***	0.54**	0.34***	0.43***
	(0.05)	(0.11)	(0.09)	(0.10)
分割点3	2.09***	4.46***		
	(0.41)	(0.88)		
Pseudo R-square	0.03	0.03	0.03	0.03
Observations	3, 212	3, 273	2, 725	2, 942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双尾检验）；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

图1显示，日本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结婚意愿的影响不同。受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影响，家庭政策只能显著提高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但并不能显著影响其他社会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假设2中关于女性结婚意愿的假设被验证。也就是说，受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中产阶层女性结婚和生育面临的焦虑和成本担忧可能更高。因此，家庭政策对提高其结婚意愿的效果更大。但与假设3所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家庭政策对不同社会阶层男性青年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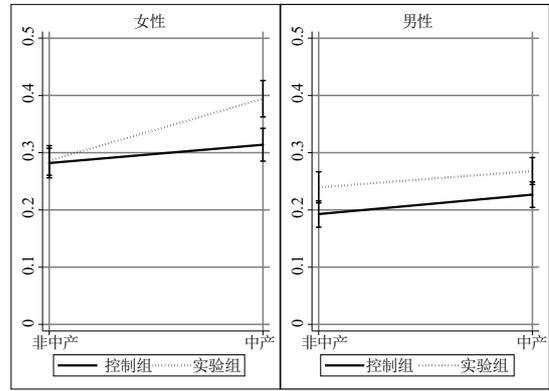


图1 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结婚意愿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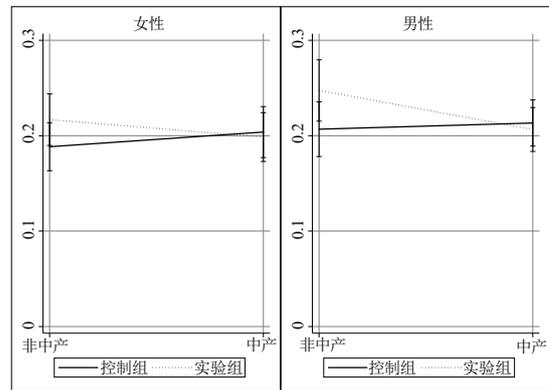


图2 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关于日本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图2显示，日本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的生育意愿的影响也没有统计上显著性差异。因此，图2的结果拒绝了假设2和假设3中关于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生育意愿影响的内容。

日本的家庭政策对日本青年的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相同。日本的家庭政策能显著提高青年的结婚意愿，但却无法提高其生育意愿。受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日本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结婚意愿的影响不同，但却无法显著地影响不同阶层男女的生育意愿。我们发现，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敏感人群和重点关注对象。总体而言，本研究证明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不同；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日本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影响存在差异。

六、他山之石：日本经验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的启示

家庭政策是当今世界各国解决低生育和晚婚化问题的主要社会政策手段，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折射出我国“十四五”时期人口政策的重要变化。本文旨在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与中国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文化和性别平等意识等方面更加相似。本文使用日本问卷实验数据,考察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此外,还集中探讨了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背景下,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级男女影响的差异性。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研究结论。

首先,分析证明,日本正在实施的通用型家庭政策,即通过提供津贴和补助以维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政策,只能提高结婚意愿,却无法显著提高生育意愿。这可能是生育成本过高,家庭政策所提供的补助在高昂的育儿成本面前“杯水车薪”的缘故。分析证明了提高生育积极性的难度。这启示,我国在制定家庭政策体系时,需要考虑结婚和生育成本差异,提高支持力度,减少青年在生育方面的后顾之忧。

其次,研究发现,在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下,日本家庭政策对不同阶层青年男女结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由于中产阶级女性在结婚和生育问题上面临的压力较大,家庭政策对其结婚意愿的提升效果更大。从理论贡献来讲,日本经验研究证明了将社会性别分工和性别平等纳入家庭政策分析框架的必要性,为家庭政策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案例。政策意义方面,本研究证明,在传统社

会性别分工背景下,中产阶级女性需要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在制定时,也需要高度关注这些重点人群。

最后,日本晚婚和低生育出现的另一社会背景是长期和终身雇佣文化下出现的长时间劳动工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超负荷工作和加班成了日本雇员的生活常态。家庭中的家务、育儿、照顾老人都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企业提倡长时间劳动,而家庭中女性又需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和照顾老幼的责任。这造成女性更加难以平衡家庭和工作关系。不少女性在结婚和生育后不得不辞掉工作,成为家庭主妇。因此,长时间劳动工作模式会造成高学历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成本进一步提高,其结婚和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我国也要警惕长时间劳动工作模式对结婚和生育率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网络社会心态发展规律与引导策略研究”(19ZDA149),中国社科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性别平等和社会经济变迁下家庭支持政策研究”(2021YQNQD0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龚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森泮: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刘川菡: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日研中心)

讲师,博士后

责任编辑/陈晨

参考文献:

- [1] 吴帆. 欧洲家庭政策与生育率变化——兼论中国低生育率陷阱的风险[J]. 社会学研究, 2016, 31(1): 49-72+243.
- [2] Esping-Anderson G.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0, 70(2): 532.
- [3] Koppi Walter. Faces of Inequality: Gender, Class, and Patterns of Inequalit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Welfare States [J].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000, 7(2): 127-191.
- [4] Esping-Andersen G. Hybrid or Unique?: The Japanese Welfare State between Europe and America [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997, 7(3): 179-189.
- [5] Van de Kaa Dirk J.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J]. Population bulletin, 1987, 42(1): 1-59.
- [6] Surkyn Johan, Ron Lesthaeghe. Value Orientations and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 in Northern, Western and Southern Europe: An Update [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04, 3(3): 45-86.
- [7] Bumpass Larry L, Ronald R. Rindfuss, Minja Kim Choe, Noriko O. Tsuya.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Low Fertility [J].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09, 5(3): 215-235.
- [8] 许琪. 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3): 33-43.
- [9] 贺光烨. 专业选择与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发现[J]. 社会, 2018, 38(2): 213-240.
- [10] 许琪. “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6): 102-129+244.
- [11] Ahmed Salma, Fielding David. Changes in Maternity Leave Coverage: Implications for Fertility,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Child Mortality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8, 241(C): 112573.
- [12] Karsten Hank, Michaela Kreyenfeld.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hild Care and Women's Fertility Decisions in Western Germany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3, 65(3): 584-596.

- [13] Becker Gary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4] Anne H. Gauthier.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7, 26 (3) : 323-346.
- [15] Billingsley, Sunnee, Tommy Ferrarini.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21 European Countr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4, 76 (2).
- [16] Vining Daniel R. Family Salaries and the East German Birth Rate: A Comment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 (4) : 693-696.
- [17] Francis G. Castle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Changing Preferences and Family-Friendly Public Policy in 21 OEC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2003, 13 (3) : 209-227.
- [18] Kogel, Thomas. Di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within OECD Countries Really Change Its Sign?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4, 17.
- [19] National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R]. Population Statistics, 2017.
- [20] Fukuda N. Marriage and Fertility Behaviour in Japan: Economic Status and Value-Oriented [M]. 2016.
- [21] Raymo James M, Miho Iwasawa, Larry Bumpass. Cohabitation and Family Formation in Japan [J]. Demography, 2009, 46 (4).
- [22] 丁英顺. 日本应对低1生育政策再探讨 [J]. 东北亚学刊, 2019 (2) : 133-152.
- [23] 王伟. 日本少子化进程与政策应对评析 [J]. 日本学刊, 2019 (1) : 117-135.
- [24] Peter McDonald.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00, 17 (1) : 1-16.
- [25] Peter McDonald. Low Fertility and the State: The Efficacy of Policy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6, 32 (3) : 485-510.
- [26] Thomas A. Diprete, S. Philip Morgan, Henriette Engelhardt, et al. Do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sts of Children Generate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Rates?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3, 22 (5/6) : 439-477.
- [27] Hochschild Arlie, Anne A. Machung.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Familie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M]. New York: The Penguin Books, 2012.
- [28] Patricia Boling. Demography, Culture, and Policy: Understanding Japan's Low Fertility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8, 34 (2) : 307-326.
- [29] Pedulla David S, Sarah Th ebaud. Can We Finish the Revolution? Gender, Work-Family Ideal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80 (1) : 116.
- [30] 王森沛等. 调查实验法在社会学中的应用: 方法论评述 [J]. 社会学评论, 2022, 10 (6) : 230-252.
- [31] Gong Shun, Senhu Wang. Family Policy Awareness and Marital Intentions: A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al Study [J]. Demography, 2022, 59 (1) : 247-266.

(上接第95页)

- [45] 许怡, 刘亚. 母职初体验: 基于自我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城市女性哺乳实践研究 [J]. 山东社会科学, 2017 (8) : 95-106.
- [46] [57] 胡疆锋. 亚文化的风格: 抵抗与收编——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 [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2007: 61.
- [48] 胡玉宁, 徐川. 青年圈群脉动的媒介感知与文化诠释——基于“饭圈”现象的叙事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 (11) : 70-79.
- [49] 杨嫚, 钱程. 嵌入式抵抗框架下粉丝的跨国参与研究——以韩国偶像的中国粉丝群体为例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0 (3) : 80.
- [50] 曾庆香. “饭圈”的认同逻辑: 从个人到共同体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0 (19) : 14-23.
- [51] 毛佳佳. CP亚文化的风格解读——以“博君一肖”为例 [J]. 视听, 2020 (12) : 130-131.
- [52] [美]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57.
- [53]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 [J]. Human Relations, 1954 (7) : 117-140.
- [54] 赵志裕, 温静, 谭俭邦.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 [J]. 社会学研究, 2005 (5) : 202-227.
- [55] 蒋淑媛. 鄙视链视域下青年文化的群体偏见与认同危机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8 (12) : 13-18.
- [56] 毛丹, 王敬雅, 陈佳俊. “饭圈”观察: 组织特征与圈内外关系 [J]. 社会学研究, 2021 (6) : 90-112.
- [61] 刘诣, 汤国英. 生产、维持和崩塌: 明星人设的三重逻辑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9 (12) : 80-86.
- [62] 孙佳山. 从人设到CP: 青年文化新周期与明星制度的迷 [EB/OL]. 中国青年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6036790445903059&wfr=spider&for=pc>. 2020-08-26.
- [63] [美] 乔纳森·特纳, 简·斯黛兹. 情感社会学 [M]. 孙俊才, 文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64] 潘泽泉. 理论范式和现代性议题: 一个情感社会学的分析框架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4) : 52-56.
- [65] 吴文羽. CP, 或商业运作的“伪物品” [EB/OL]. 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GB/n1/2021/0719/c404027-32162590.html>. 2021-07-20.
- [66] 郇晓燕. 数字化社会的乌托邦幻象与合理重建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2 (4) : 102-108.
- [67] [美] 凯斯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M]. 毕竞悦,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 [68] [法] 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刘成富, 全志刚, 张一兵,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 2000.